

比较视野中的全球化与社会变迁

卡斯特

(南加州大学, 传播学院, 美国)

摘要: 对于全球化的状况及其后果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基础上, 通过对大量的事实性材料的细致分析, 把全球化的讨论推向更加坚实的平台。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 它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

关键词: 全球化, 社会变迁, 文化认同,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被命名为全球化。全球化使得世界的各个部分更加相互依赖, 但是当全球化被谈论时候出现了很多的概念上的分歧与混淆。而这种混淆部分地是因为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作为学者, 我们的使命首先就是使用分析性的概念, 在一个数据和经验性观察的基础上, 重新理解和澄清对全球化的界定和认识。其次, 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理解全球化, 而要避免将全球化简单地与西方化、美国化等同起来。因此, 今天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基础上, 通过对大量的事实性材料的细致分析, 把全球化的讨论推向更加坚实的平台。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信息系统化的过程, 它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一个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社会, 这个信息社会的形成又有赖下列条件: 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立, 而这个设施的建立不仅仅意味着互联网、计算机化和移动电话, 而且也意味着运输, 既包括空中运输也包括海洋运输。它使得全球形成一个网络。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新组织形态的产生。任何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都与一定的新组织的诞生密切相关。这个新组织就是指在一个网络化的社会结构, 各个公司内部、以及不同公司之间通过新技术使得他们的连接成为可能。所谓核心的全球化, 在我看来首先就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金融市场就必然是一个全球化的金融市场, 不存在相互间严格的区分。这个核心活动的第二个因素是信息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货品和服务业的一体化, 而这个一体化的过程主要有跨国公司及其网络来完成的。从统计数据来说, 跨国公司的雇员不过是两亿人, 虽然这个数字只占全球的劳工数量的很小一部分, 但是就是这两亿人对全球的 GDP 贡献达到

40%。这个 40%并不是说它的生产完全在本土完成的，而是通过地区性、国家间等合作形式展开的。中国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向国外输出了多少商品，而在于中国的生产、销售等已经建构性地成为全球化体系的一部分。新的通讯技术可以使全球化的触角延伸到非常贫困的地区。比如小灵通服务就是一些相对边缘的地区可以廉价地获得这种通讯服务，而在某种程度地也融入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现在有一些大的传媒公司掌控着全球的 75%的传媒产品的生产，而且其中很多的公司设立在美国。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个现象就草率地认为美国在控制着全球的传媒生产，事实的真相要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媒介生产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形态间决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传媒的全球化生产事实上是与本土化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当媒介公司在制作它们的产品时必须充分考虑产品的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即必须把产品的文化诉求在地化，通过修饰、增删、变换等各种方式充分地吸纳本土文化，以便使媒介产品的消费者能够在心理上接受这种文化标准。比如默多克集团在面对中国、印度观众时自然会采取不同的举措，以满足来自不同文化形态的观众的消费需求。而新闻的全球化一样地存在这样的生产模式。如美国的 CNN 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只有这样一个能够提供 24 小时新闻服务的机构。其实在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一样地出现了这种新闻服务。因此，可以说，新闻生产一方面在全球化，而同时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力量、国家投入的差异，这个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差异甚至紧张感的过程。跟此相关的是文化的全球化，在价值和规范的领域中，整个世界日益陷入相互依赖、制约、穿透的文化一体化进程中。我不想简单地把它界定为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进程，事实要比这种描述复杂得多。文化全球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往往借助一些本土文化的特色，同时又保留了它最基本的方面。所谓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指芭蕾舞等高雅艺术的世界化，同时也包括足球、体育、互联网上大量的可以免费下载收听的流行音乐等各种流行文化。全球化过程并不意味着必须而且能够包括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而是说这个进程是被权力关系所主导的，也就是说这个全球化的网络会吸收那些对其有利的元素，而尽量抵拒、排斥那些对其不利的因素。在非洲存在与全球化网络密切相关的人群，而在美国一样地存在被网络排斥在外的人群。帕瓦尔多是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在这里聚集着一批相当富有的在网络化社会中生存的知识精英。仅仅一街之隔的对面是南美黑人聚居的拉丁区，在这里有着高犯罪率，经济贫困，他们就完全处身在网络之外。1999 年的美国西雅图的反全球化运动往往被媒体当作反全球化运动的典范，其实当时的这个运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反全球化运动，而仅仅是反对资本的全球化。比如说通过人权运动来反对全球化导致的某些群体的贫困化，这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大量的支持。他们并不是支持他们的运

动，而是支持他们的运动所捍卫的价值。还有一些反全球化运动是试图保存在全球化运动中迅速地被边缘化的土著文化。另一些运动主要是反抗被全球化过程所排斥的认同感，这些认同包括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当然最核心的是宗教认同。如伊斯兰社会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是宗教原因，同时也包括社会原因。伊斯兰运动反对的是全球化话语，反对的是以西方价值为主导价值的全球化过程。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采取非常极端化的暴力方式以恐怖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抗，这种暴力反抗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和后果。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个独立部分，必须将前者看作是后者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谈谈这个全球化过程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当然是一个经济奇迹，也是全球化的典范。这个奇迹使中国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这个转型并不仅仅是经济上与全球的接轨，而是在很多社会制度设置上被充分地纳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表面上看好象是对中国本身蕴涵的潜力的释放，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处于 15 世纪的时候，在技术上比欧洲要发达得多。但是因为当时及以后的帝王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主动隔离的方式，导致了几个世纪后中国的衰落。现在中国重新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与世界协同发展，可以说，中国现在的发展是逆转了过去的相对封闭的历史传统的结果。中国企业的诞生似乎是复活了古已有之的企业文化，这在上海、广东等地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第二个是省级政府、地方政府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在推动当地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第三个问题是外商投资，事实上直到 1990 年代中期，对大陆进行投资的主要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侨胞，他们通过台湾、香港积极地在大陆投资。随着经济的活跃，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到中国来投资，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与中央政府打交道，而是与一个个地区性的地方力量接触和合作。当地企业家、当地政府与跨国公司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另外，中国存在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群体，这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社会结构。虽然中国同时也有很多的只能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群，但是不容否认的中国工程师传统和受良好教育的群体的存在便利了中国的全球化。前几年美国伯克利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在美国的硅谷，中国人和印度人占全部的执行总裁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中大部分是中国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硅谷若没有中国人和印度人，是无法实现它的繁荣的。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微观经济政策，来平衡和调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中国进入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谨慎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全面的全局化。我认为在全面的全局化和完全的拒绝全球化之间采取这样一种相对保守的策略是非常关键的，尤其在金融政策方面更是如此，而且这种策略不应是一种短期行为，我认为这种政策应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延续。对于中国来说，用市场来交换跨国公司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非常重要，事实上它成为

推动中国经济在 1990 年代后期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良性的动态过程，而且也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两极化以及部分人群的边缘化。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在生产性不发达的国有经济区域与发达的外资领域的两极化态势。地域上的两极化即在沿海与内地的断裂也应该尽力去避免和弥合。发展并不简单地就是一个经济发展，而是调节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化进程。全球化必然导致社会转型的发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要面临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公共服务的建立，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卫生防疫系统的有效形成。中国现在整个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相对于 20 年前的状况乏善可陈，生产药物的水准虽然在突飞猛进，当时这个进步与大多数的人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消费能力。此外，中国的全球化可能会导致出现一种不可控的城市化现象，因此而使城市产生大量的无家可归者。很多到过中国的专家都认为中国的全球化可能会导致出现危机，事实上在很多发展至上主义盛行的国家，消费主义流行，整个社会日益原子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危机的征兆。这种现象似乎在重演 15 年前在一些发展主导一切的国家曾经上演过的悲剧。社会变迁也是一个政治能力发展的过程，需要通过发展政治能力来妥善处置可能出现的危机。所谓政治能力主要是指两个方面：首先，因为中国领土非常辽阔，必须加快去中心化的进程，加强地方自治的能力，从而培育出一个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共同体，而是处于政治能力体系中。在卷入全球化和发展经济两个维度中，中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个例。我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在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是可持续的吗？

当今世界一方面存在全球化运动，同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并存着很强劲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如何阐释这种表面上看来很冲突的全球现象是摆在学者面前的现实课题。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运动中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型。中国就是一个典型。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而民族国家并不能单独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来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必须形成国家网络来合作性地解决问题，而无法单独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当然，在这些合作中民族国家可能会丧失了一些文化自主性，但是却获得了效益。欧盟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示范，形成了新组织形态，但是并没有损害每个欧盟内国家的主观利益。中国、巴西和美国的合作也是如此，上海合作组织也是一个典范。在某些人看来，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文化系统的核心价值受到侵蚀，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虽然全球化在如火如荼地行进，但是在世界主义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和地区认同三者中，绝大多数的受调查者认同的是地区文化，因此我们不必先入为主地就认定全球化就必然意味着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毁灭性打击。当然，在保存和发展区域文化中，市民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

会建制，市民社会的形成当然需要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但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简单地对立起来，事实上它们是交织在一起，而且相互发生作用。市民社会能够拓展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而政府应该鼓励这种空间的生成。在城市的全球化过程中同样可能存在这样的忧虑，即很多市民担心随着个体主义消费经济的兴起，一些新的原子式的个人仅仅是为了居住而聚居在一起，大量的高尚住宅区的兴建也就意味着原有的城市传统文化与社区文化的消亡，其实这也是对全球化的一个误解。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所谓城市文化，文化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全球化确实淘洗了城市中一些相对古老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它又在促成新的文化形式的产生，而这些新文化形态往往与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存在血缘上的延续性。全球化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来进行的，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是它们的竞争优势的关键点，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常常发生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这也是一些学者对全球化可能导致的伦理上的困境的一种思考进路。在我看来，首先要追问的是跨国公司的产品是不是确实系他们自己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如果不是，而仅仅是对公共服务机构的成果的变相“剽窃”，或者仅仅做一些枝节或技术处理，那么这种所谓核心技术本身就不存在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应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发展中国家广泛运用。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Vicissitude in Comparative Eyesight

Caste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Media Institute, America)

Abstract: We must base our analysis of globalization situation as well as its output on observation, thus we can lead the globalization argumentation to a more dependable flat roof through analyzing plenty of factual materials subtly. Globa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formation being systematized, its realization must rely on a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society whose core is new technology.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social vicissitude, culture identifying, native

收稿日期: 2005-09-12

作者简介: 卡斯特, 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著名的信息社会学家。